



# 贵州省博物馆

## 黔贵大地 文化多彩

本报记者 陈隽逸

“菱石虽小，内蕴贵州文化千山千岛。”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一座菱形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建筑外墙整体呈棕色，并点缀有彩色色块，显得庄重又活泼，这便是贵州省博物馆。

贵州省博物馆始建于1953年，现藏有反映贵州历史文化的出土文物、化石标本、近现代文物、民族民俗文物、瓷器、书画、玉器等5.3万余件，尚在整理中的自然标本和古生物化石30多万件。

2017年9月，贵州省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新馆建筑面积4.7万余平方米，目前常设“民族贵州”“古生物王国”“历史贵州”3个基本陈列，还有数字体验馆、非遗剧场、4D影院、学术交流区等功能区，成为集展览、研究、教育、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 聆听悠远历史故事

“历史贵州”主要包括“探访观音洞”“夜郎寻踪”“建省之路”“文教兴延”“黔山红迹”5个部分，生动展现了贵州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

1964年，黔西观音洞遗址的发现拉开了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序幕。观音洞遗址位于黔西普安镇观音洞村，它是贵州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长江以南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

黔西观音洞遗址出土石制品3000余件，加工简单，刃口较为陡直、厚钝。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20多种已灭绝的哺乳动物化石。据此，考古学家将该遗址年代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展厅内用一整面墙来展示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各类石器，反映了石器打制技术到磨制技术转变的漫长历程，从中可以窥见人类何时出现审美、何时开始用火。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战国秦汉时期，夜郎称雄于以今贵州为主的广大区域，贵州因此被称作“夜郎之地”。据介绍，在贵州境内发现的赫章可乐遗址、威宁中水遗址、普安铜鼓山遗址等可能是夜郎国的活动区域。

在“夜郎寻踪”单元，一座墓葬复原场景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墓的上下方各有一个巨大的铜釜，铜釜腹上部对称纵向置两只环形大耳，铸工精良，器形规整，器壁光洁匀称。

“这种埋葬方式叫‘套头葬’，是2000年在赫章可乐遗址发现的。”贵州省博物馆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周小炜介绍，这种埋葬方式十分特殊，有说是为了保护头颅，也有说是为了炫耀财富和地位，还有可能是缘于当地族群的一种原始宗教意识，祈求对后人的永久庇佑。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明代平播钟。

汉武帝时期，掀起开发“西南夷”大潮，夜郎等地被纳入汉王朝行政管理体系。汉代铜车马是贵州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件铜车马出土于贵州兴义万屯汉墓，整车由大约300个零部件组成，是迄今为止汉墓出土铜车马中最完整、最精致的一件，对于了解汉代车制、冶炼工艺具有重要价值。铜车马呈马拖车状，马蹄微微向前，步态优雅，马嘴微张，作嘶鸣状。车为双曲辕车，车篷用青铜卷曲成覆瓦状，厚度仅0.1毫米，轻薄如纸。

《东汉会要》记载：“贾人不得乘车马。”汉代社会等级制度严格，车马是官僚、贵族的专用交通工具。结合此铜车马的形状和工艺，其主人身份应为县级以上官吏。

唐乾符三年（876年），太原人杨端应诏收复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开始了对播州的世袭统治。展厅里两顶金凤冠引得观众啧啧赞叹。金凤冠由纯金打造，数百颗红、蓝、绿宝石镶嵌其中，花团锦簇，精美绝伦。金凤冠是当地老百姓在遵义高坪杨氏墓群中发现的，因当时未经科学严谨的考古发掘，原墓主人信息已丢失，但从仍可窥见播州杨氏的奢华。

平播鼎和平播钟见证了统治播州725年的杨氏政权的覆灭。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为平息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明军分八路进攻播州，杨



宋代鸳鸯纹彩色蜡染女套装。

本文图片均由贵州省博物馆提供

应龙的军事要塞海龙屯被攻破。播州之役结束后，贵州巡抚郭子章为纪念其功绩铸造了平播鼎和平播钟。铜鼎圆形深腹，鼎足为兽首柱状，口沿面铸有“平播安黔之鼎”六个大字。钟上横列篆书“平播报德之钟”，钟腹部有一周篆书铭文，由郭子章撰写，记述其接任贵州巡抚参加征讨杨应龙反叛之事，着重记述关帝数次托梦于他和妻子，故功成后铸钟、鼎置于贵阳武庙。

### 饱览海洋生物化石

远古时期，贵州地区曾是海洋，后经地壳运动变为陆地。贵州古生物化石种类丰富，发现了以关岭生物群、兴义生物群和盘县生物群为代表的大量三叠纪海洋爬行动物化石。在“古生物王国”展厅，可以看到从埃迪卡拉纪到第四纪的古生物化石，时间跨度为距今6.35亿年到距今258万年。

东方恐龙头化石是这个展厅最珍贵的展品。据周小炜介绍，这种化石仅见于今贵州省六盘水市一带的盘县生物群中。

“东方恐龙头”意为“东特提斯地区具有恐怖头骨的爬行动物”，是三叠纪海洋中的可怕猎手。东方恐龙头龙全长27米，而脖子长度就超过全长的一半。由于脖子和身体相隔很远，在捕食时，它通常会把身体藏起来，只伸出小脑袋，等到猎物靠近时，迅速张开嘴巴将猎物吸食进去。

“很多人听到贵州龙的名字，以为它是一种形体庞大的恐龙，其实它非常小巧。”在胡氏贵州龙化石前，周小炜介绍，成年后的胡氏贵州龙体长通常只有21厘米，目前发现最大的有59厘米，最小的只有3厘米。

1957年，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胡志在贵州兴义绿荫村农家墙壁的石头偶然发现一种化石。经过走访，他了解到当地岩层里有不少这样的化石，便将几块化石带回北京，交由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鉴定。杨钟健将其命名为胡氏贵州龙，这是由中国学者发现并研究、命名的第一种海生爬行动物。

### 领略多彩民族文化

走进“民族贵州”一楼展厅，仿佛进入一个少数民族村寨。吊脚楼上挂着成串的玉米和辣椒，门口立着一棵枫香树，不远处有一座风雨廊桥。吊脚楼是贵州地区的特色民居，楼底部用柱子架空，一来可以通风防潮，二来可以抬平房基，适宜山高坡陡、气候湿润的环境。

二楼展厅着重展示民族服饰。苗族姑娘盛

装、瑶族女夏装、侗族妇女偏髻、水族马尾绣背扇……缤纷多彩的服饰齐聚一堂，成为贵州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的缩影。

“通过走访调查，我们了解到全省大概有180多种苗族服饰，目前展示的有80多种，大都是从各地征集而来。”周小炜说。

展柜里的银角头饰精美别致。红布面上镶着两排水涡纹，间饰长方形银花块。银花块上排列着蝴蝶和水涡的纹样，水涡缠绕在蝴蝶中，亲密无间。头顶为U形角造型，中间数片长方形银片呈扇形排列，好似太阳光芒。

这是20世纪90年代从雷山西江征集来的银围额。在苗族传说中，蝴蝶与水涡恋爱，产下12个蛋，从蛋里孕育出最早的人类。苗族人把这些祖先图腾放在头饰上，表示对祖先的崇拜，希望这些神性祖先护佑自己。

宋代鸳鸯纹彩色蜡染女套装是展厅里唯一一套考古出土的服装，1987年出土于贵州省平坝县桃花村。该套装上身齐腰上衣，前襟和后背为整幅彩色蜡染片，袖口用丝线贴绣锁边。下身百褶裙，采用蜡染间填色工艺绘鸳鸯纹两周。这套服装蜡染线条流畅纤细，技艺炉火纯青，为研究古代蜡染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展厅一角静立着苗族祖鼓，这是牯藏节上必不可少的祭祀用品。牯藏节是苗族盛大的祭祀仪式，每13年举行一次，包含请牛、选举牯藏头、吹笙鸣炮、斗牛宰杀等活动。通过古老而神秘的仪式与祖先对话，祈求富裕安康，同时传承民族文化，维系族群价值观。祖鼓是从一整根原木中截取一段挖空成筒，两端绷上牛皮，扎紧钉牢制成。鼓筒中间有一个小洞，代表祖先灵魂出入的门。

在黔东南清水江一带，每年农历五月廿四日至廿七日会举行龙船节。贵州省博物馆藏有一套100多年前制作的清代龙船，是清水江地区保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龙船。

每到龙船节，在外地工作的小伙子们要请假回家过节。按照苗族习俗，只有男性能够划龙船，女性则会划在龙船头挂上鸭、鹅等家禽，船头挂的家禽越多，代表这艘船的人气越旺。龙船下水前要进行一系列祭祀活动，祈求清水江的龙保佑当地风调雨顺。

贵州省博物馆保管部副研究员张婵向记者讲述了征集龙船时的故事。“当年将船打包好准备运回博物馆时已是凌晨，仍有一批村民打着手电筒到江边来送别大龙船。村民们说这是祖辈传承下来的，已是他们生命、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龙船节成为清水江沿岸一项独具特色的体育赛事，包含着当地人民祈求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



汉代镶宝石金冠饰，内蒙古博物院藏。

张羽腾摄

“华夏服饰太震撼、太养眼了，国之瑰宝！”

“为了看成博这个服饰展览，把春节回家的火车票给改签了。”

……

成都博物馆举办的“云想衣裳——丝绸之路服饰文化特展”，自1月25日开幕以来备受欢迎，一段段观众留言，便是对这次展览最好的肯定。

“这是一场时空跨度大、精彩纷呈、琳琅满目的特展，也是一场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丝路精神、充分发挥博物馆间交流协同作用的年度大展。”成都博物馆馆长任舸说。

“云想衣裳”展策展人、成都博物馆历史文物部主任和策划研究部主任魏敏介绍，此次展览汇集了来自中国丝绸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等22家文博单位的186件展品，包括丝绸品、服饰、陶俑、画像砖等，其中不乏多之前较少进入大众视线的中小型博物馆的馆藏珍品。展览通过“丝路初开与汉锦西传”“民族服饰的融合发展”“织造技术与样式革新”“衣冠王国”四部分，表现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服饰文化及其发展轨迹，勾勒出一幅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绵延不断、欣欣向荣的绚丽画卷，让观众尽情领略华夏服饰之美。

走进展览现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彩绘胡人牵骆驼俑。骆驼人高鼻梁，高颧骨，络腮胡浓密，头戴虚尖高帽，上身穿着浅色调圆领紧袖开襟长袍，下身穿着皮裤，足蹬黑靴。骆驼双目圆瞪，仰天嘶鸣，雄劲有力。骆驼号称“沙漠之舟”，通行于丝绸之路之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纺织工艺传播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

展厅里，来自湖北荆州马山战国墓的纁衣、凤鸟花卉纹锦袍（复制品），诉说着先秦时期中国丝织业的发展；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褐色对鸟菱纹绮地“乘云绣”，展现了汉代先进的织绣工艺和寓意祥瑞的服饰文化；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龙形金项饰、镶宝石金冠饰，证实了外来文化与中原服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一尊汉代塑衣色彩彩女俑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女俑面目丰满，身材修长，里外共穿三层立领右衽衣袍，最外层为乳白色深衣长袍，衣襟处皆有各色锦纹；腰间系红色腰带，裙摆下垂，下摆呈喇叭状；足外露，穿平底圆头船形鞋。据考古学家推测，这尊女俑为汉代侍女形象，从其着装可以看出汉服色彩鲜艳，款式突出形体之美。



前秦紫纁褙，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杨勇摄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成都为起点的北方丝绸之路河南道十分兴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服饰文化在丝绸之路争奇斗艳、交融贯通，形成了恣意洒脱、不事雕琢的服饰风尚。甘肃出土的前秦紫纁褙，袖口宽博，腰身阔落，扎染纁点呈方形，均匀平铺，错落有序。如此大面料的绞纁衣十分难得，身着其衣，有飘逸洒脱之感。前秦紫纁褙有碧、绀两色，共6片，褙幅之间挑色拼接织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尚爆款”。

在服饰文化大融合的这一阶段，西域已开始在当地生产丝织品，纹样融合中西文化特色，带有独特的异域风情。甘肃高台县出土的采桑丝帛画像砖，真实描摹了魏晋时期西域纺织生产场景，体现了中原纺织技术在丝路沿线的传播。来自宁夏盐池县博物馆的狩猎图金“方奇”，狩猎武士具有游牧民族特征，有翼狮子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艺术元素，外框上的龙纹又是中国传统纹饰的代表，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融于一体，堪称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

大唐盛世，丝路繁华，唐代服饰承秦汉、魏晋之风，收丝路沿线诸国之美，深刻影响了东亚地区的服饰发展，成就了中华民族“衣冠万国”的美誉。唐开元年间的彩绘灰陶女俑，头梳发髻，身着曳地长裙，足蹬翘头履，罩黑色大折领外披，双手拢于腰间，仪态端庄大方，雍容华贵。千年之后，透过这栩栩如生的陶俑，仿佛看到了那个流光溢彩的华章盛世。



左：唐代红地刺绣圆珠纹袷袋，右：唐代褐地刺绣花并纹囊袋，均为甘肃省博物馆藏。

张羽腾摄

成博特展尽显丝路服饰文化之美

刘裕国